

东北亚研究

东北民族史研究

(三)

蒋芳松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东北亚研究

东北民族史研究(三)

蒋秀松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州古籍出版社

(豫)新登字 05 号

东北亚研究

——东北亚文化研究(葳)

蒋秀松 著

责任编辑 穆 易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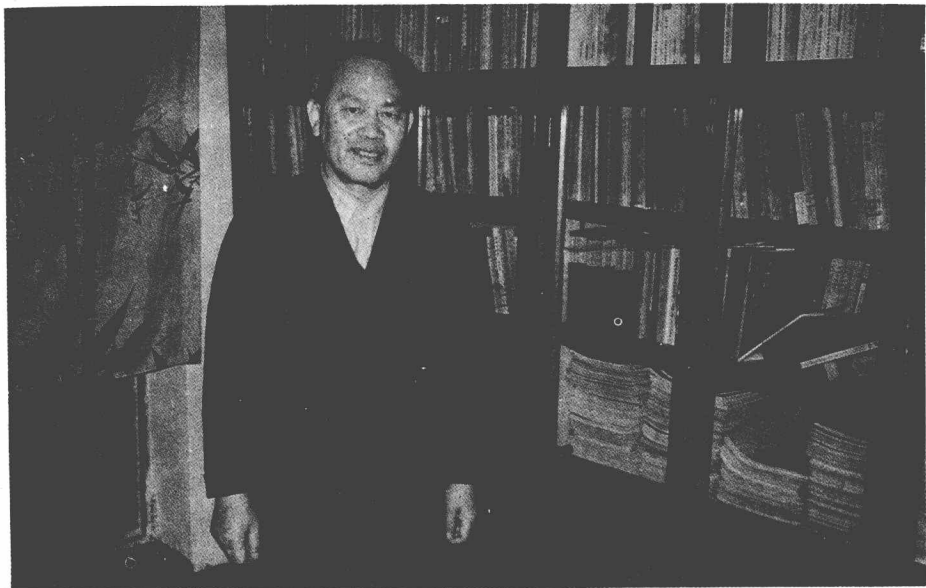
沈阳东亚研究中心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848.625 印张 19607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套

ISBN7-5348-1363-8/K·456 定价:5400.00 元(全三十卷)



作者近照

蒋秀松，广西全州县人，1936年11月30日生。1951年初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夏转业到武汉钢铁公司，1957年秋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62年大学毕业即入东北文史研究所，学习古文古史。70年代初到五·七干校锻炼，1972年初回到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后改称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从事中俄关系史、东北民族史等方面的研究。现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沈阳东亚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吉林省民族干校兼职教授。主要著作和资料汇编有《沙俄与东北》（合作）、《抗俄名将萨布素》、《女真史》（合作）、《东北民族史纲》、《东北民族史研究（三）》、《精评白话金史纪事本末》、《清实录东北史料全辑（合作）》、《清实录台湾史资料专辑》（合作）、《明经世文编东北少数民族史料摘编》等，先后发表论文、译文数十篇。

《东北亚研究》总序

东北亚目前包括六个国家和地区：蒙古、朝鲜、韩国、日本及俄罗斯的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和中国东部和北部地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东北地区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正处于东北亚各国的中心位置，它东和北邻俄罗斯，西邻蒙古，南接朝鲜，隔海与韩国、日本相望。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它自然地应该成为东北亚各国交往的枢纽。在历史上，中国也曾起过这样的作用。汉唐以来，中国长期是东北亚经济文化最先进的国家，东北亚各国间的交流长期是以中国为中心，呈幅射状态。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文化积极影响着东北亚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当时中国也是对东北亚各国各地区最为了解的国家。当时中国有关东北亚各国各地区的记载，至今还是研究这些地区的重要史料，其价值甚至超过他们本国的史料。

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落后了，东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超过了我们。这些年来，反过来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影响着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东北亚各国各地区的了解也落后了。有一段时间，不仅我们对东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了解、研究落后于他们本国，甚至我们对自身的了解、研究也落后于东北亚某些国家。这种落后与我们长期的闭关自守是分不开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又再次加强了和东北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但是中国在东北亚应有的地位还未完全恢复。我们并不想恢复中国在汉唐时对东北亚的统治地位，我们只指望和东北亚各国建立平等互利的交往，在东北亚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但要做到这些，一方面必须促进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迎头赶上东北亚的先进国家和地区；一方面必须加强对东北亚各国的了解和研究，这两者又是互相联系的。只有促进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才能为我们更多了解东北亚各国奠定物质基础。也只有加强了对东北亚各国的了解和研究，才能更好向各国学

习,以促进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只有加强对东北亚各国的了解和研究,才能知己知彼,更好地和东北亚各国联系交往。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认识,总认为我们在研究东北亚各国时必然落后于他们本国,我们拿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成果。但是对任何问题的看法,都有一定的立场观点,各国各自有不同的立场观点。今天中国在东北亚事务中日益起着更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中国人站在自己的立场观点来重新认识东北亚的历史和现实,而不是照搬别人的观点,东北亚各国也有必要认真了解研究中国人对东北亚问题的立场观点。没有彼此间新的认识为基础,要建立东北亚和中国的新的关系是很困难的。

因此,我们早就决心加强对东北亚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决心把我国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放在东北亚各国总的发展中来重新认识,决心研究我们在历史上和东北亚各国的交往和所起的作用,并进而研究我们和东北亚各国的关系及应承担的责任。

我们决心系统整理总结我国学者对东北亚的研究成果。弄清我们对东北亚究竟知道多少,不知道多少;过去哪些看法是正确的,哪些看法是需要改进的。也要让国外学者知道中国人对东北亚各方面问题有我们的立场观点,必须了解和尊重我们的观点,我们不会再让别人歪曲和篡改历史,任意摆布我们。我们要用我们的学术成果让大家知道,我们已准备好和各国学者在学术上交流与争鸣。这就是我们编这套书的宗旨。

我们力求在本书中全面反映我国学者对东北亚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的观点,但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和一些客观上的困难,可能一时还实现不了我们的想法,但我们有决心再接再厉,最终一定实现我们的宗旨。

孙进己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目 录

第一编 综 述

- 一 建国前东北民族史研究之概述····· (3)
- 二 新中国东北民族史研究之概述····· (9)
- 三 东北考古综述(上)····· (17)
- 四 东北考古综述(下)····· (28)

第二编 辽及辽以前女真研究

- 一 女真与靺鞨····· (39)
- 二 辽代女真诸部刍议····· (47)
- 三 “东女真”与“西女真”····· (56)

第三编 金代女真研究

- 一 论女真族的兴起····· (69)
- 二 女真与高丽间的“曷懒甸之战”····· (79)
- 三 关于公岭镇的地理位置····· (88)
- 四 《高丽史》中的“东真国”····· (95)

第四编 元代女真研究

- 一 元朝对东北地区的经略····· (109)
- 二 元代东北女真族的分布····· (114)
- 三 元代东北女真族的社会状况····· (120)
- 四 元代的“合兰府”····· (125)
- 五 《开元新志》对女真等族的记述····· (131)
- 六 高丽末期的东、西女真····· (139)

第五编 明对女真的政策研究

- 一 明代女真各部的族属及其分布····· (149)
- 二 羁縻卫所和羁縻政策····· (154)
- 三 关于奴儿干都司的问题····· (165)
- 四 从永宁寺碑看明代东北各族的关系····· (176)

五	明代女真的敕贡制·····	(182)
六	明代内迁的女真人·····	(198)
七	明初东宁卫都指挥使—金声·····	(211)
八	杨木答兀叛逃事件评述·····	(217)
九	“杨里人”考·····	(229)
十	明初朝鲜半岛东北部之女真诸部的归属·····	(237)
第六编 明代建州女真研究		
一	《李朝实录》中的兀良哈·····	(247)
二	斡朵里部何时南迁·····	(250)
三	斡朵里、兀良哈与朝鲜“六镇”·····	(259)
四	“庚寅之变”与猛哥帖木儿西迁·····	(270)
五	论建州左卫的东迁·····	(277)
六	论凡察、童仓之率部西迁·····	(285)
七	“建州女真先处开原者叛入毛怜”新释·····	(293)
八	毛怜卫的变迁·····	(298)
九	论十五世纪三十年代朝鲜两次入侵建州·····	(310)
十	关于建州女真的迁徙、集聚和组合·····	(321)
十一	试论李满住在建州女真兴起中的作用·····	(332)
第七编 明代海西女真研究		
一	海西与海西女真·····	(343)
二	略述忽刺温女真对朝鲜的“朝聘”·····	(353)
三	“阿哈娄得”非“鄂伦”之对音·····	(362)
四	海西女真的迁徙·····	(365)
五	海西女真的核心卫分·····	(371)
六	扈伦四部的兴起·····	(380)
第八编 明代野人女真研究		
一	明代的野人女真·····	(389)
二	七姓野人考·····	(392)
三	嫌真兀狄哈研究·····	(397)
四	从兀良哈与兀狄哈的比较中看女真各部发展的不平衡性·····	(414)
第九编 清初东北少数民族研究		
一	清初的呼尔哈部·····	(431)
二	呼尔哈与赫哲·····	(443)
三	论十七世纪黑龙江地区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	(448)
后	记·····	(458)

第 一 编

综 述

一 建国前东北民族史研究之概述

建国之前的东北民族史研究,从其发展进程看,大体可分为晚清和民国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东北民族史研究的发端时期,它附属于当时新兴起来的边疆史地学,尚未成为独立的学科,一般采用的方法仍是乾嘉考据学派的方法,研究的领域有限,取得的成果也比较浅薄;后一阶段是东北民族史研究初具规模的时期,一些学者已用近代以来的科学方法从事东北民族史的研究,进行文献整理,着手民族调查和考古发掘,研究的领域有所扩大和深入,出现了一些较有份量的论著,民族史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下面即分别叙述以上两个时期东北民族史研究的概况。

(一)

晚清东北民族史的研究,是跟当时我国人民抗御西方列强侵略,特别是沙俄侵略的斗争相联系的。1840年,西方列强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胁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攫取了各种特权,把中国推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在这些侵略者中,沙俄则利用它与中国接壤的有利条件,力图吞噬中国领土,对我国从西北到东北的整个北部边疆构成了严重威胁。面对沙俄侵华的步步进逼,激起了一些爱国学者对北部边疆的关注,他们积极从事此地区边疆史地的研究,包括对东北民族史的研究,相继著书立说,经世致用,以服务于抗御沙俄侵略的需要。在这方,成绩较为突出的有何秋涛、张穆、魏源等,重要的著作有《朔方备乘》、《蒙古游牧记》和《圣武记》等。

何秋涛(1824—1862),字愿船,福建省光泽县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官刑部主事。他长于史地之学,是当时著名的学者。眼见沙俄东侵,外患当头,促使他究心时务,认为宜有专书,以资考镜,以裨人们了解北疆的历史和斗争形势。于是他致力北疆史地的研究,撰《北徼汇编》。咸丰八年(1858年)十一月,清廷命将所纂书籍呈览。咸丰帝阅后,称其书于制度沿革、山种形势“考据详明”,足备参考,因赐名《朔方备乘》。^①

《朔方备乘》共80卷,备述了秦汉以来,特别是清朝对东北、西北和北方边疆的经营和

^① 《朔方备乘》卷首。

治理,当地少数民族的状况及其与历代王朝的关系。同时,对加紧侵华的沙皇俄国进行了研究,叙述了中俄关系。《朔方备乘》是一部兼有述和作的边疆民族历史地理的综合性汇集,编撰旁征博采,力求详备,而且利用当时新的民族和地理方面的知识,进行考证,记述精洽,颇有见地,可以说,它是近代早期研究边疆民族与历史地理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

张穆(1805—1849),字石洲,又字诵风,山西平定人,幼年时父母双亡,投靠其表舅莫宝斋。道光十九年(1839),应顺天乡试,以受诬作弊被斥,退出考场,从此弃绝举业,发愤读书,专心致志于著述,成为当时著名的学者。他学识渊博,著述丰富。对边疆民族历史地理的研究,尤多建树。主要著作有《蒙古游牧记》。此书共16卷,备述了蒙古诸部的历史源流、地理位置、盟旗沿革、王公世系以及他们与清王朝的关系等。其中卷1《内蒙古哲理木盟游牧所在》记科尔沁、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等部;卷2《内蒙古卓索图盟游牧所在》记喀喇沁、土默特等部;卷3《内蒙昭乌达盟游牧所在》,记载汉、奈曼、巴林、扎鲁特、阿鲁科尔沁、瓮牛将、克什克腾、喀尔喀左翼等部。这些蒙古部落居处东北地区,其记述属东北民族史的内容。《蒙古游牧记》是一部系统的蒙古史地专著,清人评论此书时说:“其结构则详而有体也,征旨则瞻而不秽也,考订则精而不浮,确而有据也”。^①可见它是研究蒙古历史的重要文献。张穆撰著此书,未竟而卒,遗稿由何秋涛整理补辑刊行。

此外,张穆还校勘刊行了一些有关东北民族史的重要文献,如《元朝秘史》、《元圣武亲征录》等。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是近代早期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其著述甚多,有关东北民族史的有《元史新编》和《圣武记》等。《元史新编》取材广博,所谓“采四库书中元代各家著述百余种,并旁搜《元秘史》、《元典章》《元文类》各书,参订旧史”。^②这是清代私修元史较早的一部,具有开拓性。《圣武记》共14卷,分两大部分,前10卷记述清朝兴起及其统一中国的史事,后4卷为“武功余记”,是作者自己对有关军事问题的论述。其中《开国龙兴记》,记载满族崛起辽东,统一东北各族的史实,《国朝绥服蒙古记》,记载内蒙古六盟包括东北三盟的分布及历史。《圣武记》充分利用了当时边疆史地学的研究成果,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何秋涛、张穆、魏源等人的著述,开创了当时边疆史地学的风气,从而推动了东北史地,包括东北民族史的研究。继他们之后,在东北史地与民族历史学方面,晚清阶段的代表人物,就要推崇曹廷杰了

曹廷杰(1850—1926)字彝卿,湖北枝江人。他早年在北京国史馆做汉誊录,于1883年吉林,在三姓靖边军后路营中办理文案。在此以前,于1858年,1860,沙俄强迫清廷签订了《璦琿条约》和《北京条约》,鲸吞了中国大片领土,并继续扩大其对华侵略。当曹廷杰来到了北边疆的时候,正值沙俄再度掀起侵华狂潮。面对沙俄如此贪婪成性,造成中国东北边疆危机,曹氏满怀对沙俄侵略者的义愤,以极大的爱国热忱从事边疆民族史地的研究,在短短的几年中,先后撰写了《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东编纪要》、《东北省与地图说》等著

① 祁俊藻:《蒙古游牧记序》

② 魏源:《拟进呈(元史新编)表》

作。

《东北边防辑要》成书于光绪十一年(1885)三月,曹廷杰纂述“有关于时务者”若干篇,汇成《东北边防辑要》,^①“以期便于观览,有神实用”。成为曹氏的第一部东北史地专著。《东北边防辑要》分上、下两卷。上卷辑有《盛京险要考》、《朝鲜沿革及形势考》、《明季三卫分建诸国考》、《三姓疆域考》、《征东海集渥瓦尔喀部》、《库页岛沿革形势考》、《艮维窝集水源考》、《卦勒索考》、《吉林根本说》、《伊通州沿革形势》等编;下卷辑有《征索伦》、《征罗刹》、《尼布楚事迹》、《分界碑文考》、《外兴安岭山脉河道中俄分属考》、《黑龙江察边考》、《乌底河公中地方考》、《界碑地考》、《黑龙江险要》等编。在这些“考”、“说”中,曹氏较详尽地阐述了中国王朝对东北边疆地区的经营和管理,记述了当地各族的分布和源流,论证了黑龙江流域自古以业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为当时的抗俄斗争提供了用力的历史依据。

《西伯利东编纪要》,成书于光绪十一年(1885)十月,是曹廷杰亲临俄境探查的记录,附地图7幅。^②其中关于奇喀喇、奇勒尔、俄伦春、剃发黑斤、不剃发黑斤、费雅喀等族的记述,很有学术价值。

《东三省舆地图说》成书于光绪十三年(1887),是曹氏札记的汇集,内容较广,涉及民族、地理、考古等方面,直接有关民族的有《国初征服吉江二省各部考》、《窝稽说》、《黑水部考》、《开元、开原辨》、《抚余府、黄龙府、夫余路、扶余国考》、《渤海建国地方考》、《肃镇国考》、《赏乌凌说》、《使犬部说》、《赫哲喀喇说》、《额登喀刺说》、《特林碑说》等其他地理考古诸篇,也都与民族史有关系。金毓黻先生称赞此书“精于考证”,“多发前人所未发,宜全看”。^③

曹廷杰对东北历史地理与民族的研究,既继承了何秋涛等人的优良传统,又大大地超越了他们,其鲜明的特点,一是历史研究与现实的抗俄斗争相结合,二是以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尤其是《西伯利东偏纪要》,完全是实地考察的记录,具有第一手资料的价值。总之,曹廷杰是近代第一个对东北疆民族与历史地理进行全面调查研究的学者,他的著述为东北边疆史的研究提供了可信的资料,充实了内容,在学术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与曹廷杰同时或稍后,还有一些爱国学者从事东北民族历史地理的研究,撰有一些著述,如林寿图的《启东录》,就是记载古代东北各族源流的专著。此外,还提一提屠寄和黄维翰研究东北民族历史地理的成就。屠寄曾主持黑龙江舆地的测绘工作,绘有《黑龙江舆图》,并著《黑龙江舆图说》一卷,对黑龙江境内的山川城池作了详细说明;他所撰《蒙兀儿史记》,是近世蒙古史的一部重要著作,涉及东北民族历史地理的部分,也多精辟见解。黄维翰曾任呼兰知府,纂修《呼兰府志》,审定《黑龙江乡土录》等书。于当地民族历史地理考订详明;所撰《黑水先民传》,较系统地汇集了历史黑龙江地区的人物传记。晚年又撰《渤海国志》三卷,记述渤海国史事。这些著作对东北民族史的研究,皆有参考价值。

① 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序》

② 参见丛佩远、赵鸣岐编《曹廷杰集·前言》

③ 曹廷杰:《上希元禀文》

(二)

民国时期东北民族史研究,我们从本世纪20年代讲起。当时,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不少学者注意到中华民族形成史的研究,有的在大学讲坛上发表其关于中国古代民族的源流、系属和分布的史学见解,有的撰写了一些有关中国民族史方面的论著。其中有关东北民族史的论著也多了起来,如史学大师王国维,他晚年着重研究蒙古史,涉及东北民族史的论文就有《黑车子室韦考》、《靺鞨考》、《盟古考》、《金蜀壕》等。这些文章详述源流,考据精当,至今仍为研究者所引征。此外,吴廷燮的《室韦考略》(载《四存月刊》1922年14期)赵铤的《索伦纪略》(载《东方杂志》22卷16号,1925年),刘节的《好太王碑考释》(载《国学论丛》2卷1号1928),卡鸿传的《历史上东北民族之研究》(载《东北丛刊》1930年第二期)等,皆是当时东北民族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论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妄图侵占全中国。在国土沦陷、民族危亡的时刻,有更多的爱国史学工作者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担忧,他们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关注东北民族史的研究,挥笔上阵,著书立说,有确凿的史实驳斥日本侵略者鼓吹的“满蒙非支那论”,论证东北自古以来就是祖国的神圣领土,古来东北各族就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从而将东北民族史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阶段,成为抗战史学的重要方面。在这些爱国史家中,我们首先着重介绍金毓黻先生和冯家升先生及其著述。

金毓黻(1887—1962),字静庵,辽宁省辽阳人。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对于文学、史学、古文学、金石、考古诸方面皆有兴趣和功底。据其自述,从1922年起,他即抱着“忧乡之心”致力于东北地方史的研究,整理地方文献,广泛搜集资料,留心访古问俗,撰有大量著述,涉及面较广。其代表性的著作,属方志的有《奉天通志》,属文献汇编有《辽海丛书》,属专史的有《渤海国志长编》,属通史的有《东北通史》,属札记的有《辽东文献征略》,属金石的有《东北古印钩沉》等。

《奉天通志》。1927年,奉天通志馆成立,着手修志,由当地的硕学名儒担任总纂。金毓黻是其中之一,负责纂修《山川志》和《金石志》。到“九·一八”事变前夕,此书的初稿基本完成。事变后,形势变化,一些编辑人员相继离去,余下几位总纂则年已老迈,而金先生那时正年富力强,且学识渊博,所以《奉天通志》的通纂工作自然落在他的肩上。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他坚持工作,修改审定,贯通前后,经过几年的努力,此书终告完成,刊行问世。人们高度评价此书,认为它取材广博,资料丰富,内容翔实,“诚为辽宁地方史志之总集,亦为辽宁地方文献资料之渊薮,堪称辽宁史籍之最”。

《辽海丛书》是金毓黻主编的一部东北古代文献汇编。1930年,金先生延请同人组成编辑部,拟定体例,当即开始了此书的编辑工作,随后且编且印,各集于1933—1936年间先后付梓刊行,全书包括正集与附集,正集为10集,每集1函10册,共收书83种,377卷;附集收书4种,共132卷,分为32册。金先生对东北古代典籍素有研究,选择典籍极为严格。《辽海丛书》的问世,是东北民族研究中的一件大事,它保存了东北各族文化的精华,为东北民族史的研究汇集了珍贵的史料,是金先生的一大贡献。

《渤海国志长编》是金毓黻撰写的一部渤海国史专著,成书于1932年。本书包括正志15卷,前志2卷,后志3卷,共20卷。正志采别史之例,立纪、表、传、考四体,纪、表、传三者,分别述渤海国史实,诸考则既具正文,复加案语,详为考证。前志为总略,汇集了有关的国内外文献资料;后志为文微、丛书、余录。《渤海国志长编》叙述渤海民族兴衰递嬗之迹为主,对于辽灭渤海建东丹的史实和渤海遗民的史料也都兼及,可以说是一部渤海民族志。此书史料丰富,叙事详尽,考据精当,至今仍不失为研究渤海国史的重要参考书。

《东北通史》上编,初版于1941年,1944年又再发行,是金先生撰写的一部东北通史。1936年,金先生设法摆脱日寇的羁缚,逃离伪区,先至上海,又到南京。次年南京沦陷,他又辗转入川,先在重庆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后到四川三合东北大学任教,“兹乃俯仰一室,追述故乡往事,纂为一书”,即此《东北通史》上编。全书计6卷39章,约40万言,首卷系总论,叙述“东北之涵义及其异名”、“东北史与地方史”、“东北史与民族”、“东北历史与地理”、“东北史之范围与分期”等;2—6卷分四期,详述自上古迄元末东北各族的历史。他在“东北史与民族”一章说:“东北史者,东北民族活动之历史也,无东北民族,则无所谓东北史,故述东北史,必以民族居首焉。”金先生正是遵循这一原则撰写东北通史的。《东北通史》上编在东北史研究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内容翔实,论述多发前人之所未发,直至今日,它仍是研究东北民族史的基本参考书。他原打算继续编撰《东北通史》下编,“起明初迄现代,亦为六卷”,惜乎未成。

《辽东文献征略》,成书于1927年,是金毓黻的早期的著作。此书内容属札记,分郡邑、山川、金石、人物、典籍、杂录等目,以记辽宁史事为主,兼及吉、黑两省。

《东北古印钩沉》于1944年出版,是东北一部古代印谱。书中共收集自汉代至明代印谱41印。并对每印的时代、印文、背文皆作了考释,说明其发现地及收藏者和拓赠者。这部印谱对研究东北历史和金石,都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资料价值。除此以外,他还撰有《东北文献零拾》、《辽海书微》、《东北要览》等著作。1946年,他撰写的《宋辽金史》出版,被列为大学历史系教科书,它简明地叙述了辽、金与宋的关系,并兼及西夏、西辽、高丽与宋的关系。此外,他还撰写了一些有关东北民族史的论文,就不再赘述了。至于他留下的《静晤室日记》,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其中有大量的学术札记。此《日记》现存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已在整理出版。金毓黻先生堪称东北史,包括东北民族史的开拓者,一生用力最勤,硕果累累,为后人的研究做了许多奠基工作。

冯家升(1904—1970),字伯平,山西省孝义县人,194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史学系,获硕士学位,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东北大学等校的史学系任讲并应聘为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名誉。编辑,跟顾颉刚先生主编《禹贡》。在大学学习时,他就热心于东北民族史的研究,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即为《契丹名号考释》(载《燕京学报》第13期,1933年),研究生论文为《辽史与金史、新五代史互证举例》。后目睹日寇入侵,东北沦陷,“东北非支那论”的谰言泛起,他针对这谬论发表了《我的研究东北史地的计划》(载《禹贡》1卷10期,1934年),以鲜明的爱国立场,强调研究东北史的重大意义。为了让大家了解国外研究东北史的状况,又先后撰写了《东北史地研究之已有成绩》、《日人对于我东北的研究近况》、《日人在东北的考古》等文,重点介绍了日俄等国对我国东北的研究情况,指出他们的研究宗旨是为其侵略政策服务的,激励国内学术界勿忘自己的责任,要奋发图强。与此同时,他

率先攻治东北史,几年中,相继发表了《太阳契丹考》(载《史学年报》第3期1931年8月),《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载《史学年报》第4期1932年6月),《满州名称之种种推测》(载《东方杂志》30卷17号1933年9月),《辽金史地志互校》(载《禹贡》1卷4期,1934年4月),《东北史中诸名称之解释》(载《禹贡》2卷7期1934年12月),《周秦时代中国经营东北考略》(载《禹贡》2卷11期,1935年2月),《汉魏时代东北之文化》(载《禹贡》3卷3期,1935年4月),《述肃慎系之民族》(载《禹贡》3卷7期,1935年6月)等论述。从以上发表的论文看,他治东北史,研究范围属通史,从远古到清代,皆有涉及,特别是他所撰的《辽史源流考和辽史初较》,于1933年由哈佛燕京社出版,即为学术界所推崇。解放后,引书经他整理增入《辽史与金史、新五代互证举例》的内容,名为《辽史证误三种》,于195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39年他应邀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任研究员,担任辽史研究工作,曾与美国人魏特夫合撰《中国社会历史——辽》和《辽代宗教》。这两种著述模版,都是用英文写的。1947年春回国后,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研究员。

在30年代初期的东北史研究中,不能不提到傅斯年等人撰著的《东北史纲》。此书的编撰,也是以适应举国要求抗日的潮流,作者开宗明义,即驳斥日寇鼓吹的“满蒙非支那论”,表示要从历史上论证东北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指出了日本及西洋人把东北三省称为“满洲”的险恶用心,是“专图侵略或瓜分中国而造之名词”^①。《东北史纲》原定由傅斯年、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合撰,第一卷于1932年出版,其它各类均因抗战而未正式出版。仅从第一卷看,其中史料丰富,论证精当,不乏独到的见解,如傅先生提到的“商之起源,当在今河北省东北境,”“商之兴也,自东北来,商之亡也,向东北去”,^②就是一例。《东北史纲》是较早的一部东北通史,仍可作为东北民族史研究的基本参考书。

在东北民族史专史方面,还应提到孟森先生对清前史的研究。清前史也可称为满族形成史。孟森(1869—1937),字莼孙,别号心史,是国内研究明清史的著名学者,尤专于清前史的研究。他一生著述很多,这里仅介绍他晚年撰写的《明元清系通纪》一书。此书初名《清朝前纪》,继改《满洲开国史》,后经增补,于1934年改为本书名。“明元”是指明代纪元,“清系是指清代世系,就是说:用明代的纪年来记述清代的世系。全书分前编与正编两大部分。该书是孟先生研究清前史的集大成之作,史料丰富,论述系统而精深,是研究满族形成史必读的著作之一。

随着民族学的传播,国内学术界于30年代初已开始对一些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研究。1930,民族学者凌纯声等对东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进行了考察,撰有《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本书不仅充分地利用了历代的文献资料和现实的调查资料,而且利用了国外研究的成果,论述的范围包括民族源流、民族关系、民族生活状况和社会情形等方面,内容全面而翔实,文图并茂,对我们研究东北民族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30年代至40年代这个时期,还有一些关于东北民族史的论文,散见于当时的刊物上,为数不少,可查阅有关目录索引,此不再赘。

① 傅斯年等:《东北史纲》

② 同上。

二 新中国东北民族史研究之概述

新中国的建立,为史学的繁荣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当然,也就为东北民族史的研究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这40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东北民族史的研究工作逐渐全面而深入的开展起来,曾对东北少数民族组织了较大规模的社会历史调查,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愈益展开,同时进行了大量的史料收集和文献整理工作,为东北民族史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在科研实践中,老一辈的专家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新一代的民族史学工作者也相继成长起来。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东北民族史,在这个领域的各个方面,诸如地区民族史、族别史、民族关系史以及各族之政治、经济、文化的专史等方面,皆取得丰硕的成果,撰有大量的论著。回顾解放以来的东北民族史研究,也可分为三个时期:1949—1966年,是东北民族史作为科学的中国史一个重要分支进行研究的开创时期;中间是十年动乱时期,东北民族史的研究工作也遭破坏而中断;1976年,打倒“四人帮”以来,为这一学科的恢复和发展时期。十年动乱期间,除考古工作稍有进展外,东北民族史的研究工作陷于停滞状态,所以我们要讲的只能是其前后两个时期的进展情况,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十年动乱,东北民族史的研究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实行民族平等和团结政策,曾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当时,在东北地区,达斡尔族的识别则是较突出的问题。1953年8月至10月,一个由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的专家、学者和民族工作者组成的调查组到黑龙江省和内蒙古呼纳盟达斡尔人居住地区进行调查。他们根据充分的历史和现实材料,确认达斡尔人是单一的民族,并非蒙古族的一支。随后,傅乐焕先生撰有《关于达斡尔的民族成分识别问题》一文,对达斡尔族的名称、人口分布、历史来源进行了研究,并从他们的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社会文化心理状态等方面进行识别,从而得出结论:达斡尔族应该被承认为一个单一的民族。与此同时,林耀华先生等撰写了《达斡尔民族亲属和风俗习惯的调查报告》,对于达斡尔族社会文化心理素质方面提供了达斡尔族是单一民族的根据;王静如先生撰写的《关于达斡尔语言问题和初步意见》,指出了达斡尔语是属于蒙古语族中一个独立的语言;陈雪白先生撰写了《达斡尔经济生活》,对构成该族共同经济的畜牧业、狩猎业、放木排、捕鱼,物质生活水平等作了介绍;陈述先生写了《关于达呼尔的来源》,追叙历史,论证了达斡尔来源于古契丹族,王鍾翰先生撰有《达呼尔人出于索伦部考》,指出达呼尔在清初属于索伦部,康熙初年才以“打虎儿”之名见诸文献。这种有关民族识别的调查,是民